

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叙事： 价值意蕴、潜在危机与化解策略

曹清燕，欧露雯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叙事学范式为抽象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传播与培育提供了有效话语媒介与共通意义空间。从价值建构的规范性维度剖析，意识形态叙事具有从抽象到具体的总体把握之认知价值、从言语到行为的话语实践之行动价值、从特殊到普遍的扩展传播之文化价值。然而，在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面临叙事主体去中心化危机、叙事场域去空间化危机和叙事情境去时间化危机。为此，要辩证结合意识形态叙事一元与多元、动态更新意识形态叙事内容与形式、适时均衡意识形态叙事供给与需求，实现叙事主体的重塑、空间的再构以及时间的激活。

关键词：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价值意蕴；潜在危机；化解策略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6)01-0154-10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汇聚民心、巩固政权、引领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叙事”原本是文学的研究范畴，核心是讲故事。“叙事”与“意识形态”结合，构成作为复合范式的“意识形态叙事”，指通过叙事以表现意识形态存在，即通过一定的故事选择、话语策略和图像视觉等鲜活灵动的样态表述特定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方式^[2]。在马克思看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正是表达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观念体系，但作为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只有借助一定的话语体系，才能有效对接大众的认知图式，而叙事的生动特性正有助于解决意识形态“怎么说”的现实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叙事的载体、方式和效能各不相同。进入数字时代，以报纸、广播、电视、书籍为主要载体的传统的一元化叙事模式面临话语困境，新的具有场景化、视觉性、互动式等媒介特质的数字化叙事形态逐渐成为主流，深刻改写和重构着意识形态叙事实践。客观分析并辩证认识数字时代带给意识形态叙事的时与势、利与弊、危与机，并进而探讨应对策略，对于将数字技术逻辑的意识形态叙事潜能现实化为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25-08-16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项目——名师工作室(25YXSZ01)

作者简介：曹清燕，女，河南南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与实践；欧露雯，女，福建将乐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联系邮箱：714291412@qq.com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综述

当前,数字技术正加速推进意识形态叙事从传统样态向数字图景的现代化转型。然而,数字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是新生事物,其介入和赋能意识形态叙事必然在展现出一定前景的同时,隐含着可能的风险。直面这一现实问题,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者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围绕叙事语境的辩证性研究。数字时代已然改变了意识形态叙事的话语场域和传播结构,展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矛盾态势。李江静、黎晓琳从正反双重影响的维度指出,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存在传播立体化、场景化与碎片化、娱乐化并存,话语表达创新与权威解构同在,以及内容分发精准化与价值认同分化等方面的矛盾结构^[3]。从叙事的基本维度(主体、视角、媒介)出发的研究在揭示数字技术提升意识形态叙事精准度、亲和力和表达力的同时,辩证指出了去中心化叙事、微叙事话语表达、信息茧房效应等新挑战^[4]。立足于叙事的基本规定的考察指出,数字媒介内含着的多层次延展的叙事场景、情感化参与的叙事话语、可视化叠加的叙事符号,以及技术赋能的叙事机制在有效拓展影响力的同时,也暴露出叙事秩序断裂与同质化、叙事框架弱化与工具化、叙事主旨虚化与娱乐化等多重隐患^[5]。

二是着眼于叙事形式的创设性研究。借助数字智能技术,意识形态的叙事形式进一步更新为图像化叙事、视觉化叙事、场景化叙事、情感化叙事、游戏化叙事等。学界围绕以上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的新形态分别展开了具体探析:图像化叙事的共情互动增进了情感认同,感官享受增进了利益认同,具象表达增进了话语认同,沉浸体验增进了价值认同^[6];场景化叙事的在场、沉浸、交互、建构等内在特质有助于实现意识形态叙事内容全景式渗透、叙事主体具身式沉浸、叙事价值精准式抵达和叙事效果内在式提升等效能^[7];信息环境、用户选择、内容生产三个维度的情感转向合力驱动着意识形态的情感化叙事^[8]。

三是针对叙事困境的策略性研究。针对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的可能风险,学界尝试从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领域给出可行策略。杨章文基于心理学“认知—情感—意动”结构理论指出,破解意识形态叙事现实之困应循守致知、激情、诚意、励行的实践逻辑^[9]。储成君针对数字时代虚假叙事的意识形态风险,着重从科技伦理、主体意识、法治体系、技术体系等方面论述了意识形态安全屏障的建构方向^[10]。王新刚、何作为则从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对象的维度提出了应对意识形态叙事碎片化的举措^[11]。

总体而言,既有的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相关研究呈现出多方位、多视角、多领域的特征,但仍有深入探讨的学理空间:一方面,目前对作为前提性理论基础之叙事及意识形态叙事的概念内涵、逻辑结构、价值意蕴,缺乏一定的理论澄清;另一方面,对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的风险审视与应对举措的探讨多从具体、微观入手,总体性、原则性的研究相对不足。总结意识形态数字化叙事呈现的实然现象,分析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应然姿态,需要我们在进一步提炼、把握意识形态叙事的本质规定性的基础上,从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性高度进行有效澄清与规范导引,而这也正是本文的首要研究任务。

二、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的价值意蕴

叙事即讲故事,“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12]。真切的、生动的、可感的、有理的意识形态

叙事不仅有益于将抽象的意识形态体系具体化、生动化和形象化,也有助于意识形态从个体认知到整体行动的实践转化,以及从国别特殊到人类普遍的传播扩展。目前,数字技术在视听、互动等方面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叙事优势,以其作为基础介质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叙事,能使受众置身数字叙事“超真实”的拟像之中,进而技术性增强意识形态叙事在认知、行动与文化层面的功能与意义。

(一) 认知价值: 抽象到具体的总体把握

叙事本质上是故事与受众间的一种理解性、认同性的关联关系。“在一部叙事艺术作品中,意义所代表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一是作者创造的虚构世界;二是‘真实’世界,也即那个可为人们理解的宇宙。当我们说自己‘理解’一则叙事时,言下之意是,我们已经发现这两个世界之间令人信服的关系或关系链。”^[13]叙事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寓社会观念、道德规范、价值准则于生动故事之中,使受众沉浸其中,受其感染,由其引导。

“意识形态的形式”主要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思想观念^[14]。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形式和多元结构类型,决定其必然是抽象、复杂的。那么,如何能够将抽象、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讲深、讲透、讲活,达到“入耳、入心、入脑”的传播效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议题。叙事或“故事化”能够将抽象的意识形态转换为生动的话语体系,从而使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更为具体、可感和接受。著名思想家本雅明格外重视“讲故事的人”,因为叙事是对经验的“再生产”,“再生产”出什么样的叙事体系,就会有怎样的理解语境和意义世界。面对同一文本,不同叙事引起的受众反应亦不相同,如与一般理论灌输相比,童话是更符合儿童心智的话语叙事形式,可通过幼稚化故事表达有效实现育人效果。

叙事结构中主题、情节、视角等要素能使抽象、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实现多维度的具体展开。将叙事用于意识形态工作,背后有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作为理论支撑。马克思指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和叙述方法。“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5],作为中介的叙事是规定内容的丰富展开,抽象理论通过多角度的话语叙事能够成为“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实现从“抽象的普遍性”到“具体的普遍性”的知识学转换。例如,对于“核心”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借用提琴手和乐队的差别来加以阐明:“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毛泽东则用“桃核”予以比喻:“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17]两则生动的叙事共同为理解“领导核心”注入了更多可理解的具体内容。

进入数字时代,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及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等数字技术通过高度拟真立体图景、虚实叠加动态画面、同步追踪感知交互,为意识形态叙事创造了沉浸式、互动式、可感化的叙事场景。数字叙事的交互性、趣味化、超真实、沉浸感具有显著的话语表达优势,不仅可使“不可见的”意识形态在数字场域中转译成图像、场景、特效等多维感性图景,将平面叙事场景转换为三维甚至多维场景,而且可使受众在影像、场景、游戏等沉浸式叙事空间中充分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理解和接受意识形态叙事的内容和意义。从故事到数字化故事的转向,使得意识形态叙事更“立体”、受众的理解更“直观”,意识形态叙事的认知功能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外,数字叙事推送的精准化、分众化,更能把“具体的故事”讲给“具体的个人”,实现叙事内容与对象有效适配。

(二) 行动价值: 言语到行为的话语实践

叙事具有一整套创造同一性的闭合形式,承载着意义与方向,决定着行动与结果。马克思深刻阐明了理论、行动与叙事的内在关系:“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8](9-10)}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理论,不能替代作为“武器的批判”的行动,现实行动与理论批判有着根本差别,两者分属不同领域,即思想领域与物质领域。理论能转换为行动,但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就理论特质而言,理论必须是“彻

底”的理论、“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理论,换言之,是客观认识事物的科学理论;从理论叙事来看,必须在“彻底”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恰当地“说服人”,使理论掌握群众,即如何恰切地向群众进行理论叙事。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运用了大量极具音像视听特征的词汇,如“漫画”“马戏场”“鹅的叫声”等,生动再现了历史活动场景,描绘了“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路易·波拿巴为了模仿拿破仑而“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的皇袍的礼拜仪式”的历史笑剧^[19]。唯物史观非虚构性的现实主义叙事令人信服地道出了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结构与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18](666)},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大众化叙事。这部“天才的著作”不仅激起“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的“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18](663)},而且对消除19世纪法国社会弥漫的“拿破仑观念”、与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一种合唱”形势,都有重要影响,充分说明唯物史观叙事的“以言行事”的实践力量。

“以言行事”是语言哲学的重要内容。语言本身具有行动意义,“施行话语观念是,它是去实施一个行为,或者作为实施行为的一部分被包含在其中”^[20]。叙事内在地具有行动力,讲故事是为了讲道理,故事的意义与行动导向内在一致。叙事在为受众描绘故事图景的同时,已经悄然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认知、价值观念、政治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化为实际行动。简言之,叙事是故事从潜能到现实的运动过程中的理想性“种子”。譬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比作“三座大山”,在语用、语效层面有力地动员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和形象叙事,更是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叙事并非简单地将故事转化为数字形式,从叙事到数字化叙事的过渡不仅是叙事场景方面现实与虚拟的叠加,还是叙事效果方面情感共通与反馈力量的升华。“意识形态数字叙事超越了以无声言说为基础的传统表达,逐渐发展成为集理性、知性于一体的话语呈现机制。它能够在维持文本秩序的同时,充分释放其中的情感力量,调动社会群体的凝聚力与行动力。”^[21]具备互动性、游戏性与沉浸感等显著特征的数字叙事使意识形态叙事与受众之间的话语连接方式发生了结构性重组,即由平面呈现转向立体触达、由单向作用转向双向生产、由外在接受转向内在感受,由此受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受、代入情绪,极易产生与意识形态叙事话语同频共振的共情效应与行为反应。

(三) 文化价值: 特殊到普遍的传播扩展

当前,国际交往日趋紧密,大国博弈也愈演愈烈。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选择存在差异,不同意识形态跨国别交流、交往时极易根据自身立场对他者进行文化想象。因此,不同文化体要相互理解,就必须立足于普适的方法与媒介。“人类思维最重要的形式不是理性或分析,也不是直觉或感受,而是叙事。”^[22]叙事作为人类的本能,跨越国度、历史、文化而存在。也就是说,虽然各民族国家存在差异,但人类在认知结构、价值追求、叙事结构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其中,叙事能够通过分享故事增进理解、弥合差异。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都有具有代表性的且影响广泛的跨文化普遍性叙事,例如古希腊讽刺故事集《伊索寓言》、丹麦童话故事集《安徒生童话》、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其中,皇帝的新装、丑小鸭等故事更是耳熟能详,有着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当然,我国也不乏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在国际社会也有着一定的传播与影响。总之,一个好的叙事或故事具有跨文化的传播力及跨时间的形塑力。

数字技术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叙事传播的时空图式。首先,在数字时代,故事的传播不再受制于实体空间的时间与距离,借助虚拟空间能够实现即时性、全天候、全球性、裂变式的话语传播,使受众自由“穿梭时空”,置身沉浸式的叙事视听中,由此为叙事话语全方位、全过程、全场域传播提供可

能空间。其次,数字技术介入意识形态叙事生产,能提升叙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创造出全球受众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鲜活的叙事表达,进而提升叙事受众的群体性与接受度。最后,意识形态叙事通过数字空间中的跨文化和跨国别链接,实现了与全球受众的有效对接。全世界网民的个体化、多元化、微观化话语表达能够使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具体化,进而有助于深入理解与广泛接受意识形态叙事。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叙事还关系着国际话语权和文化遗产权的建设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算法操纵、文化输出、舆论抹黑等手段兜售西方的价值观念,同时虚构中国的负面形象。为了避免西方“话语垄断”,我国必须构建融通中外的意识形态国际叙事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上,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在内容层面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同时在形式上要善于运用数字智能叙事媒介,既通过网络实现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又借助电子屏幕展现中国人民的多彩成就,以景动人,以情感人,以此建构文化遗产权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三、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的潜在危机

数字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数字空间一跃成为人类社会生存与交往极为重要的基础场域之一,但时空界限压缩、环境开放复杂、话语多元竞争等数字时代的鲜明特征却可能给意识形态叙事带来危机。审理危机是化数字时代之“危”为“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任务。

(一) 叙事主体去中心化危机

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是无中心的多元连接,任何行动元都可以在数字空间中进行符号输入、话语表达、叙事书写,并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被任何行动元及时捕获。个体行动者构成了数字社会网络的关键节点,个体叙事话语发声的频次显著提高,由此传统意识形态叙事主体力量相对式微。过往由中心到外围的“辐射性”叙事传播路径被多元交互性的“块茎式”叙事分享模式替代,形成了一种‘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新权力结构”^[23]。

在数字技术推动叙事平权化和多元化的影响下,个体得以最大限度地享有话语叙事的言说通道,从叙事受众这一被动接受者转变成话语叙事建构的主动生产者和传播者,以往难以呈现之物得以呈现。因此社会意识形态叙事权力结构呈现出显著的个体政治化特征,即差异化、身份化叙事的合法化。由此,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各类网络主播、“UP主”等新兴叙事主体层出不穷,代表不同价值观的多元社会思潮争相传播。《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为8.33亿,同比增长1737万,占网民总数的75.2%。数字时代的去中心化社会效应带来诸多“微叙事”与“危叙事”,悄然侵蚀和解构着与民族、国家、集体紧密相关的意识形态叙事。

从群体、社群的角度来看,数字时代的“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中心”的消退,而只是叙事“亚中心”的逐步成型,即叙事的圈层化传播。圈层化传播是数字时代群体交流互动的主要方式,已成为数字时代多元文化发展传播的主要助推力量。这是因为,一方面,数字智能算法技术形成了信息茧房,受众极易集中受困于某一类话语叙事的“温室”“蛙井”中;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个体话语叙事具有本位倾向,而且海量的数字内容使个体目不暇接,个体往往流连忘返于自己感兴趣的、与自己现有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话题论坛、“超话社区”。由此,围绕个体的兴趣强度及同质化信息归属,数字时代自组织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黏性和聚合力的、相对封闭的叙事话语传播结构、场域与圈层^[24]。数字时代为“亚中心”话语叙事圈层的聚散提供了技术支持。技术平台传播渠道的竞速更新,催逼着圈层交流频次提高,从而加速形成和不断扩容多元化叙事圈层。概言之,数字时代的去中心化趋势构成了多样化圈层产生的重要基础。圈层化传播的群体化、层级化特征使群体圈层只偏好或专注于“狭隘化”或“窄化”的话语叙事内容,导致意识形态叙事内容可能会被数字算法技术自动选择性地过滤和屏蔽,由此使得意识形态叙事的传播路径、力度与效果在偏好与技术的双重维度上受到圈层化“栅栏”的层层阻隔乃至隔断。

总而言之, 数字时代(尤其是网络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既为个体话语权力的获取和叙事书写提供了技术与环境支持, 也为群体的圈层化信息传播提供了可能场域。面对数字时代“去中心化”趋向已然创造出的新式叙事结构、话语实践、传播载体和群体身份, 意识形态叙事如果不能及时更新叙事模式、手段与方法, 极易产生主流话语与多元话语的激烈对撞, 引发叙事危机。

(二) 叙事场域去空间化危机

空间在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叙事作用主要体现在叙事场域的有效供给上。首先, 空间就是社会, 是人类生存叙事的重要基础。人类在空间中展开物质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 并相应地形成语言、经验与技能。叙事主要取材于亲身实践经验或他者间接经验, 并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实践。物质性实体空间构成了叙事生产与传播的主要载体。其次, 空间是社会关系和符号意义生产的关键场域。空间中的事物, 如纪念碑、博物馆、文化墙、条幅标语、塑像造型, 甚至人类的动作姿态、眼神手势, 都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叙事价值与意义。最后, 空间中的功能分区与界限区隔为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了固定场所。在现实语境中, 学校、军营、医院、社区、家庭等现实空间以及置于其中的书籍、报刊、电视、电影, 都是集中进行意识形态叙事传播的主要场域和关键渠道。

数字技术的纵深推进使数字空间日益成为意识形态叙事的前沿阵地, 但数字空间是一个以虚拟开放和消除边界为主要特征的空间。换言之, 意识形态叙事的场域和情境开始“去空间化”。以往实体空间中被区隔、固定的整块空间形式及其意识形态叙事功能, 在数字空间中被不断消解, 被一体化的总体性数字空间所替代。因此, 基于实体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必然会遭受一定程度的冲击, 主要表现为数字空间对实体空间意识形态叙事作用力、影响力的抵消。这既与数字空间对人的社会交往的作用日益增强有关, 也与数字空间中意识形态叙事话语表达权利泛化、审核监管能力削弱相关。

数字空间的去辖域化、脱域性以及身体的不在场性, 决定了意识形态叙事难以直接锁定“非具身性”对象, 对象开始不再受现实空间中固定场域和可感活动的规约, 可以随时选择“上线”或“下线”, 甚至“断线”。即使是不同于纯粹数字社会空间的、基于实体学校的数字空间教学可以为叙事内容设定强制的视听要求, 学生仍可在屏幕前决定去留。在数字空间中, 对象不仅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意识形态叙事, 也可以自主选择接受何种意识形态叙事。随着数字时代空间形式由实向虚的转换, 意识形态叙事的作用也相应地发生了“由主向被”的变化, 由此引发意识形态叙事危机。

(三) 叙事情境去时间化危机

时间和空间既是承载人类的感官体验和物的客观实在的基础架构, 又是人类用以叙述物质运动和事件发展过程的基本参数。叙事同样存在于时间之中。一方面, 时间为叙事的生产、理解与传播提供了必要基础, 叙事是对发生于人的生命时间中的事件和经验的纪实与想象。这种纪实与想象的理解与传播, 既需要处于时间流动之中的耐心、倾听与感悟, 也需要处于时间加载过程中的发送、接收与读取。另一方面, 时间为叙事的内容、结构与要素提供了因果关系线索。叙事一定是在时间中展开的, 按照时间顺序组织、安排和讲述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时间顺序使得事件叙述富有条理, 有助于构建和把握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

数字技术发展、社会文化变迁、资本市场竞争共同推动着信息交流、互动、更新、传播的不断加速。在此背景下, “短、小、多、新、热、快、广”的叙事内容成为人们关注、交流、分享的主流。短视频、微信息成为叙事主流形式。《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 截至2024年12月, 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10.4亿, 使用率达93.8%, 连续6年位居网络视听应用细分领域第一。然而, 微叙事并没有带来深阅读, 一方面, 信息爆炸、知识进步、数字传播与多元交流叠加生产出几何级数的信息增长; 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现实时间与数字时间来回切换又生产出碎片化时间, 以碎片化时间应对海量的信息供给, 必然使得信息消费加速。个体在加速读取信息的无意识之中自觉自由自在地选择内容与进度, 个体数字空间中的视听行为因此呈现出碎片化、个性化、短暂化的特征。数字时代的个体并不满足于对既有信息和叙事的被动接受, 而是在自主选择是否加速、加速位置、加

速程度的过程中(比如拖动进度条以跳跃性选择所需信息以及倍速播放视听内容)对信息进行选择,以期实现时间的节约、效率的提高、信息的增值^[25]。《南方都市报》调查发现,68.2%的人“倍速追剧”,59.1%的人“倍速看视频节目”。《新京报》在18到40岁年龄段的受访观众群里发现,平时使用倍速观看视频的接近七成。由此可见,多数人对倍速播放持肯定态度。

处于时间之中的叙事因时间加速而失真、失温、失效。叙事的完整性具有一定的时间性,时间轴上的曲折的故事情节更加具有叙事张力和感染力,对于完整理解叙事以及全面、深刻地把握叙事背后的思想意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时代的个体虽然拥有加速读取叙事内容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可以较好地满足个性化需求,但在“只言片语”“三言两语”中,故事极有可能被肢解、被误解、被消解。与此同时,叙事话语的市场化、多元化,数字时代“短平快”的微叙事导致了内容浅薄、低俗、无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烂叙事”在“注意力经济学”的推动下,被加速制作、复制、模仿、更新、循环,极大地消耗了意识形态叙事的时间资源。

总而言之,“加速”是当下数字时代的重要表征,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时间感知,也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接收方式和叙事时间结构。在加速的过程中,人们失去了倾听故事的耐心,争分夺秒地进行着信息交流和自我表达。原本在传播与接受之间、表达与领会之间、思考与行动之间的时间被加速缩减,意识形态叙事因缺乏时间、耐心与倾听而失真、失温、失效,由此造成意识形态叙事危机。

四、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危机的化解策略

“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26]虽然数字时代使得意识形态叙事面临潜在危机,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为更新叙事载体、场景与方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科学使用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化意识形态叙事危机为生机,从而增强意识形态叙事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影响力。

(一) 重塑主体:辩证结合意识形态叙事的一元与多元

如今,多元化、个性化、立体化的传播形式替代了以往单一化、齐一化、平面化的传播形式。传统单一的官方主体进行的意识形态叙事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时代全新的传播环境和舆论生态。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与应变,必然遭遇由叙事主体去中心化带来的意识形态叙事危机。传统的单一官方主体与数字时代多元个体主体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具有辩证结合的实践可能。

一方面,要以一元为主导,引导多元。在数字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叙事内容的创作者,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必须发挥核心引导作用,积极鼓励多元主体话语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方向保持一致,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在,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也不能变。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7]因此,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确保意识形态叙事的正确方向,通过制度化的理论武装,提高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为意识形态叙事奠定坚实理论基础。其次,官方和主流媒体要通过高质量的数字化意识形态叙事内容创作和传播,深入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涵和意义,为数字时代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形态叙事提供理论指导、规范引导和价值坐标。最后,对数字空间中的多元意识形态叙事进行监管,是有效应对多元叙事的重要保障。相关部门要制定法律法规,数字平台要优化流量分配机制、健全内容审核机制,以此严格把控各类叙事内容的生产、发布与传播,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文化生态。

另一方面,在多元中丰富和发展一元。首先,积极挖掘多元主体叙事中的价值元素。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海量信息中极速地抓取与意识形态叙事主题相关的由多元个体生成的素材,并进行相应的分

类、总结与建议,可以为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丰富的素材与建议。其次,要在数字空间中设置专门的反馈渠道,广泛收集和积极回应多元主体的声音,这是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活力的关键。最后,由官方媒体主导的叙事具有规范性、明确性、权威性,但相对缺乏生动性、多样性和灵活性。富有情感张力的民间叙事往往更贴近生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从不同角度丰富和佐证官方意识形态叙事,从而使意识形态叙事更具信服力、感染力和行动力。

(二) 再构空间: 动态更新意识形态叙事的形式与内容

数字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并拆解了以往传统意识形态叙事场域内的“固态”区隔,传统意识形态叙事的场域、方法、效应因此受到了冲击。然而,无论是广袤的实体性空间,还是无边的虚拟性空间都不是平滑的,而是褶皱的,始终处于去辖域化与再辖域化的动态流变过程之中,不断生产、区隔、划分着“辖域空间”。因此,与其说数字时代解构了意识形态叙事的固定场域,不如说数字时代建构了意识形态叙事的新兴空间。传统意识形态叙事的主要场域是家庭、学校、军营、医院等固态空间,而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叙事的主要场域则是数字化了的传统固态空间,以及众多新出现的数字社交媒体平台。

数字社交媒体平台的丰富性以及数字空间的无限性,既为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了众多的传播渠道,也为多样的叙事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首先,要善于利用数字技术为意识形态叙事传播提供的多种路径。数字时代涌现出了众多数字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快手、QQ、抖音、B站、小红书等,它们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提供了多样且集中的意识形态叙事传播途径与媒介,且不受实体存在空间与线性标准时间的传播限制。因此,党政机关可以通过创建官方账号,及时在数字平台上发布和传播意识形态叙事内容,同时要注意不同平台上的受众差异并提出相应的叙事策略。例如,短视频平台受众广泛、年龄层次多样、文化程度不一,其叙事核心在于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变迁,可运用视觉化和情感化的故事表达方式探寻共情、共鸣、共振的传播“触点”;而学术类平台的受众主要为专业研究者,其叙事策略应融入当代与世界性的议题,以逻辑性和专业性叙事彰显中国故事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这样才能吸引大量用户,使意识形态叙事内容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形成传播效应。其次,要巧于使用数字技术为意识形态叙事传播提供的多样媒介形式。数字技术提供的多种叙事媒介形式,如动态文本、图像、声音、影像、VR等,摆脱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叙事形式的单一传播模式。数字叙事形式能够以具象、生动、互动、及时的沉浸式体验,充分调动多种感官,营造受众认同意识形态叙事的“在场感”,增强受众对叙事内容的“感触性”理解和“实践性”记忆,使意识形态叙事更生动、更具吸引力。最后,要精于利用数字空间技术为意识形态叙事理解提供的多彩图景。多样、生动、直观的叙事形式有助于受众理解抽象的意识形态内容。数字平台上的短视频之所以广受人们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内容生动、形象、有趣,其讲解简洁明了。因此,要善于使用短视频进行意识形态叙事。多彩图景还支持“互动式叙事”,可在具有交互功能的网页、程序中设置故事情节和互动环节,受众可以参与意识形态叙事,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接受意识形态叙事。

(三) 激活时间: 适时平衡意识形态叙事的需求与供给

对意识形态叙事的需求进行分众分析,是实现意识形态叙事有效供给的前提。意识形态叙事的精准供给,可以满足意识形态叙事的内在要求。意识形态叙事的需求与供给是否平衡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意识形态叙事的最终社会成效。数字智能算法技术为分析意识形态叙事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提供了技术支持。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意识形态叙事“需求侧”的分众分析。数字空间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空间,人们在数字空间中可以自由自在地浏览、消费、交流、发声与展示,最大程度地反映出个体和群体的行动“无意识”。大数据、网络平台、智能算法等数智化工具能够使“无意识”文本化、数据化和信息化,并富有针对性地向受众推送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叙事内容。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叙事受众的需求分析既要有质性分析,又要有度量分析;既要有个体性需求分析,又要有群体性

需求分析和圈层需求分析。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意识形态叙事“供给侧”的精准投放。在对意识形态叙事需求进行分众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意识形态叙事内容供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精准性供给。由于技术限制和观念束缚,传统意识形态叙事的供给模式是“传者本位”,供给者决定意识形态叙事内容,较少考虑受众的实际需求。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叙事实现了“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变,智能算法技术能够实现“叙事适配”,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与意识形态叙事同频共振。第二,有效性供给。传统意识形态叙事存在形式单一、信息过载、匹配错位、互动欠缺等问题。相较而言,数字平台的交互性及其内容推送的关联性,既可以使受众及时地向平台反馈个人兴趣,避免无效及无益推送,又可以使受众始终获得符合个人兴趣的内容。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意识形态叙事,能够实现叙事内容的有效供给,提高受众的接受程度。第三,即时性供给。数字技术不仅具有极强的分析运算能力,而且具有及时的预警监控能力,可以发现数字空间中的错误言论,及时构建技术预警防火墙,调整意识形态叙事内容,进行意识形态引导。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叙事不仅要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还要帮助其破除“回声室效应”、走出“信息茧房”。

五、结语

“意识形态的运行规律是把观念装进头脑。”^[28]叙事不仅能够使客观的事实得到解释和理解,而且可以将抽象概念转换为生动情节,进而深入人心。因而叙事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催发了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精神图景,同时不断冲击着传统意识形态叙事话语结构中的主体权威、时间关系及空间语境,为传统意识形态叙事带来潜在危机。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传播学层面具有场景化、视觉性、互动式的媒介特质,能够为意识形态叙事提供历史性机遇。在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直面数字化趋势,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N]. 人民日报, 2021-06-02(1).
- [2] 马忠, 张鹏飞. 意识形态叙事概念的学理辨析[J]. 理论界, 2016(6): 55-61.
- [3] 李江静, 黎晓琳. 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 10(11): 98-107.
- [4] 陈三宝. 智媒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叙事论析[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3): 18-24.
- [5] 沈海涛. 数字叙事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逻辑机理与优化策略[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6(1): 174-182.
- [6] 李苏. “视”说新语: 图像叙事赋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探论[J]. 理论导刊, 2025(2): 54-60.
- [7] 黄冬霞. 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场景化叙事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3): 99-106.
- [8] 肖唤元, 张茂杰.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策略审思[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5): 86-93.
- [9] 杨章文. Sora 类文生视频模型驱动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叙事的困境及突破之道[J]. 理论月刊, 2025(3): 15-25, 159.
- [10] 储成君. 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叙事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应对之道[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4): 48-54.
- [11] 王新刚, 何作为. 智媒时代意识形态叙事的碎片化困境及其消解[J]. 新闻知识, 2023(7): 18-24, 93-94.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12.
- [13] 斯科尔斯, 费伦, 凯洛格. 叙事的本质[M]. 于雷,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86.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413.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2.
- [16] 资本论: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84.

-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1: 439.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9] 张国启. 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及其启示: 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为例[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11): 67-76, 155.
- [20] 奥斯汀. 如何以言行事: 1955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M]. 杨玉成, 赵京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59.
- [21] 苏玉波, 李浩. 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叙事的多重症候及其治理[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9): 83-90.
- [22] 西费尔. 叙事本能: 大脑为什么爱编故事[M]. 李寒笑,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 9.
- [23] 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 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 何道宽,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17.
- [24] 马德益, 杜颖.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去中心化的困境[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108-116.
- [25] 王淑华. 加速世界的数字时间体验及观看文化[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7): 29-36.
-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11.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65.
- [28] 钟启东.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思想[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1): 11-20.

Ideological narratives in the digital age: Value implications, potential crises, and resolution strategies

CAO Qingyan, OU Luwe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sk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 is essential to proactively grasp the initiative power and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work. The narrative paradigm provides an effective discursive medium and a common meaningful spa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disseminating abstract and complex ideologies. Judging from the normative dimension of value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narratives contribute to comprehending development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eech into practical action, and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culture from the particular to the universal. However, in the digital age, ideological narratives face crises such a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narrative subjects, the despatialization of narrative fields, and the detemporalization of narrative context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dialectically integrate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ideological narratives, dynamically update their content and forms, and balanc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ideological narratives in a timely manner, thereby re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space, and time of narratives.

Key words: the digital age; ideological narratives; value implications; potential crises; resolution strategies

[编辑: 郑伟, 郑泽星]